

「五四在香港」話語的形成與重探

• 陳學然

在1930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香港沒有造成衝擊，也沒有在社會層面引起迴響，頂多只為少數知識份子關注。即便是以愛國示威運動為主調的「五四」，在香港也只造成一些衝擊而已。

五四運動自1919年爆發至今已逾九十年。基於它對中國現代史構成的無遠弗屆影響力，其研究史已然與發展史同步進行，各種研究早已汗牛充棟，而它在北京以及各大城市的在地化研究自1979年以來也已成果纍纍。諸如《五四運動在北京》、《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五四運動在浙江》、《五四運動在山東資料選輯》、《五四運動在河南》、《五四運動在江西：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五四運動在廣東》、《五四運動在四川》、《五四運動在江蘇》——甚至是《五四運動在日本》，都足已讓我們看到五四運動是一場如何波瀾壯闊的運動^①。同樣，它的影響也波及遠離北京的香港，在這塊英國殖民地引起一些迴響。

論者指出，五四時期，在北京之外的人所知道的，是政治層面的五四運動——即抗議帝國主義的愛國示威運動，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卻要一直到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後，才有較為清楚

的了解^②。這種情況同樣見於香港。基本上，在1930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香港沒有造成衝擊，也沒有在社會層面引起迴響，頂多只為少數知識份子關注。

即便是以愛國示威運動為主調的「五四」，在香港也只造成一些衝擊而已。五四運動爆發時正在香港大學讀書的陳君葆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況：「『五四』愛國運動的浪潮澎湃高漲，瀰漫着整個中國的時候，香港也受到一些衝擊，但只是衝擊而已，仍說不上震撼。」^③陳氏是受五四運動直接衝擊的人，與北京學生同呼吸、同擔國難。他知悉五四運動消息後，與校內五十多位同學爭取以大學名義致信巴黎和會，以求據理力爭中國主權。惟遭校方制止而作罷，轉而用「香港中國學生」名義拍發電文聲援北京學生，情辭急激地譴責「曹章賣國」行徑，要求北京政府電令專使「萬勿簽字；並請廢除中日前後密約，一洗奇恥」。

* 本文為香港城市大學Strategic Research Grants (SRG)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7002541, 7008061)。

他們的電文為當時參與運動的北京學生楊亮工、蔡曉舟等人注意，旋即被輯進《五四——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④。顯示五四「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主體精神價值召喚了香港學生，使他們在愛國救國的時代參與上與國內中心城市學生思想同步，讓港人在這樁現代史大事上留下文字履迹。

然而，陳氏關於五四運動的日記與回憶文章，不少言論都頗具批評性。在肯定五四排日反帝的愛國精神價值之餘，他更加感嘆五四的「民主」、「科學」不但未能影響香港，同時也未能在國內中心城市發展。借用論者之言，陳氏之「五四」回憶實際也有這樣的目的：「不斷提醒着同胞，文化啟蒙的目標還沒有達到。」^⑤同時也揭示這樣的現象：新文化層面的「五四」在香港擴散是延緩和有限的。

也許基於此，大凡研究五四運動在香港的發展史的學者，很自然以政治層面的反帝救亡運動為探討對象。陳君葆的日記和回憶文字一直備受冷待；相反，另外一位回憶者陳謙的〈「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則極受注目^⑥。他回憶「五四」的文章自刊出後便成為香港史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參考文獻；尤其是當述及1919年香港史或五四運動如何在香港播散、發展時，其論述被一再大篇幅引用，被視為真實史料而轉相沿襲^⑦。

一 陳謙的五四回憶

從陳謙的回憶到目前的研究，「五四在香港」的內涵解讀是一致的——着力彰示「五四」愛國反帝運動如何波瀾壯闊，如何在殖民地引起激烈震撼。「我香港同胞義憤填膺，愛國心

並不後人」、「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震撼全國，香港亦不能例外」^⑧成為相關研究領域裏被不斷重覆的主題。此外，被不斷引用的還有這段文字^⑨：

那時居住在灣仔的群眾，蜂擁至日本商店門前擲石示威，破毀櫥窗，高呼抵制日貨口號，警察旋制止旋發生，連續數小時不停，警察不得已勸日人商店緊閉門戶，暫停營業。並勸日僑要居家內，切勿出外閒遊，避免事故。同時各私立漢文學校的語文老師，在講壇上慷慨激昂陳述國恥，以啟發學生愛國心；又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作為課文命題。部分學生並將家裏的日貨搬至中環擺花街及荷李活道鄰近香港中環警署的地方，當眾燒毀，表示決心。家庭主婦以中興猴嘜火柴是日本商品，拒不使用。華商則在會所集會，議決提倡國貨，各大公司如先施、永安、大新、真光等則宣言今後必多採辦國產絲綢、蘇杭雜貨，並歡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檢查有無仇貨（實則有的公司掛羊頭賣狗肉，明說提倡國貨，而陰行改頭換面，出售日貨）。一時陰丹士林布及愛國布等大行其道。

上述文字顯示香港一如鄰近的廣州和其他中心城市，繼承了五四「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與精神旗幟；港人也一如國內民眾反帝排日，對國恥無不義憤填膺。再如陳謙所記，當港人湧現排日情緒時，港英政府即增強警力保護日僑及彈壓示威群眾，而日方也因港人不斷增強的抵制行動而派艦隊威嚇^⑩：

事情發生後，香港英當局深恐事態擴大，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命令全體警察無論英差、印差、華差都一律停止

從陳謙的回憶到目前的研究，「五四在香港」的內涵解讀是一致的——着力彰示「五四」愛國反帝運動如何波瀾壯闊，如何在殖民地引起激烈震撼，並成為相關研究領域裏被不斷重覆的主題。

陳謙敘述「五四」在港產生社會迴響的言論已成為一種典範。他使「五四」成為見證港人反殖、反帝、反封建的場域，盡顯港人如何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其愛國心與內地同胞無異。

休假，加派武裝警察在灣仔日人商店門前及附近街道日夜巡邏站崗；對日本僑民僑眷則嚴密保護，送食送水。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香港徵集的華人後備警察……本已在一九一八年底結束，現又再重新召集，配足槍枝彈藥，使之荷槍實彈在晚間擔任由花園道轉上堅尼地道轉下皇后大道東一帶，直至軍器廠街巡邏當值，嚴防發生事故。而日本當局立即派出長門、陸奧、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戰艦，駛泊鯉魚門外，炮口直對香港，示威恫嚇。同時駐香港的日本領事更向香港教育司提出照會，要求香港教育司指令漢文視學官查看全港各私立漢文學校，如有採用上海會文堂出版的《初等論說文範》作為課本，即須執行禁止。理由是該書內容有提倡國貨抵制日本的言論，這是有傷日本體面和妨礙英日邦交，云云。

陳謙的回憶文章讓人看見一幅幅無異於國內各大城市的圖景——港人如何激於愛國義憤而抵制日貨的故事，流傳至今而成為研究者普遍敘述的「五四在香港」印象：

北京的「五四」運動，震撼全國……香港的青年學生、市民迅速投入了這場反帝鬥爭……各大、中學校的許多中文教師，在課堂上慷慨激昂講解「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陳述國恥……居住在灣仔一帶的市民群眾，蜂擁到日人開設的商店門前示威……把商店的櫥窗搗毀……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派出「長門」、「陸奧」、「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戰艦，泊靠在鯉魚門外，把炮口對準香港恫嚇……^⑩

香港灣仔人民向日商店投石示威，並抵制、焚毀日貨。3艘日艦開

到鯉魚門外炫耀武力，港英政府下令華人後備警察開赴各地區保護日僑。由此工人開始組織工人團體……^⑪

陳謙憶寫「五四」史事時已是「事隔六十年，年老體弱，記憶力衰退，所見所聞，泰半遺忘」之時^⑫。如此一文流傳極廣後，竟成今人賴以認識「五四」在港發展之主要文獻，目下香港史的「五四」敘述，多奉其論為主臬：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運動爆發後……為了防止排日事件之擴大，港英當局派遣武裝警察在灣仔日人商店一帶、日夜巡邏站崗……日本政府則派出長門、陸奧、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戰艦，駛泊鯉魚門外，對香港示威恫嚇。^⑬

香港同胞隨即以各種方式支持〔五四運動〕……日本政府派戰艦駛近鯉魚門外，砲口對準香港示威恐嚇；港英政府唯恐事態擴大，一方面採取措施保護日本人，一方面告示市民和師生不准抵制日貨……五四運動對廣東和香港的社會都發生深遠的影響……^⑭

陳謙敘述「五四」在港產生社會迴響的言論已成為一種典範。他使「五四」成為見證港人反殖、反帝、反封建的場域，盡顯港人如何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其愛國心與內地同胞無異。但陳謙持論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譬如他把很多分布於不同年份之事籠統壓縮在一年裏發生。早期香港的抵制日貨行動和港英政府的反抵制行動被悉數塑造成1919年最矚目的「香港歷史」。於是，香港在「1919年」爆發了激烈的排日反帝五四運動，市民群起抵制日貨、衝擊日僑及其商鋪，引致政府當局嚴陣以待和日本派出三艘

巨型巡洋艦赴港「示威恫嚇」。這種敘述被一再援引和發揮，塑造出「五四」迅速衝擊香港社會各階層的歷史敘述，既凸顯五四反日、反帝、反殖民主義的歷史主題，更說明港人國人在國家危難下休戚與共的愛國情感。

二 重回歷史場域

香港於二十世紀確曾發生激烈反日運動，但與陳謙所言的是兩碼子事。當遍查早期香港報刊、政府歷史檔案後，便會發現其中差異。

(一) 發生於1928年的街頭抵制行動

1919年五四風潮的確透過報刊引起港人關注。但在1919到1925年省港罷工的前後數年間，港人未有大型抵制日貨行動。當時報刊和政府歷史檔案也未錄載承五四之風而起的排日行動。正如前說，1919年五四風潮只引起「一些」衝擊。就此，陳君葆於1959年的回憶可再供參考^⑩：

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是沒有的，可是零星的，三五個人持油紙傘結隊的遊行，並不是不曾有過。油紙傘上面也不過用大字寫着「抵制日本」，「振興國貨」這樣的很和緩的字眼。

陳氏的回憶可證諸當時流行的中文報刊《華字日報》。該報於1919年6月4日報導了陳氏提到的遊行事件。這是一場由七、八名「身穿白衫學生裝束」的中學生發起的。他們手持寫有「國貨」的油紙傘「緩步而行」，但旋即被捕。對於學生「無何種暴動而被

警察干涉」，「途人皆代抱不平」^⑪。學生由被拘至審訊和最後被判罰款，該報都有跟進。相關報導顯示商界、學界和一般市民以低調而不失積極的態度抵制日貨^⑫，不敢張揚的背後自與港英政府及早嚴加管制有關。

正如前說，五四大規模示威運動在香港是看不到的。抵制日貨行動在1920年以後雖曾發生，但具組織性的街頭行動則極少。商人和市民在抵制日貨呼聲中多只是採取不買不賣的態度。例如1923年5月9日《華字日報》轉引西報《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報導指出，包括先施公司在內的數家香港華人商行，因應日本不允取消「二十一條款」而「承認贊成加入抵制日貨」。除了是基於「愛國熱誠」而抵制日貨，同時也坦承是因為國貨以及美國、德國的「來華貨品」更為價廉物美之故^⑬。至於陳謙說的港人「蜂擁至」日本商店門前擲石示威，破毀櫥窗，這種激烈行為沒有在1919至1927年間發生，警察也沒有在這個時段勸「日人商店緊閉門戶，暫停營業」，更沒有勸日僑「切勿出外閒遊，避免事故」。同樣，香港學生也沒有在此時段把家中日貨搬到鄰近中環警署空地「當眾燒毀，表示決心」。而這一切都是發生於1928年那一年的事。觸發港人如此激烈行動的不是「五四」風潮，乃是1928年5月3日的「濟南慘案」——中國軍民六千餘人遭日軍槍殺。

當有關消息傳到香港後，觸發港人排日情緒。據報載：「濟案發生後，我國人民對於日本無不忿激，內地各處對日經濟絕交，聲浪日趨嚴重，而濟南人民遭此慘劇，各處均擬籌辦賑濟……港方亦積極進行。」^⑭5月下旬，日人商店飾櫃被連番擲石破壞，並發

1919年五四風潮的確透過報刊引起港人關注。但在1919到1925年省港罷工的前後數年間，港人未有大型抵制日貨行動。當時報刊和政府歷史檔案也未錄載承五四之風而起的排日行動。

生日人遭襲擊案件，港英政府採取措施阻止風潮擴散以免影響英日關係。據5月21日及22日《華字日報》的報導，可見當局應對手法之一斑：

當局已注意凡有日人商店之街道，均派有巡查隊嚴為防範，九龍方面亦如是，如灣仔一區，今晨已派出印差一人及印藉看更人二名巡查日商店一帶。^②

官並當庭向眾宣布儆告，略謂：「此次中日濟案事件發生，華人方面諒因激於義憤，仇視日人，然本港為法治之區，且居於中立地位，自不能任令任何一方面有不軌舉動，擾礙治安，深願本港居民安份樂業，勿得滋生事端，致干法紀。」^③

雖然警員加強巡邏，法庭亦判罰涉事者，但未能止息港人反日情緒。5月24日《華字日報》載：「自日本出兵山東，發生濟南慘案後，華僑對於日本商店，時常將石擊破其玻璃飾櫃之事，犯此事而被警探拘控於案者，已有數起。」警方為保護日僑生命財產，惟加派警員保護，「每日派差十餘人為一隊，荷槍梭巡。」嚴密巡邏保護的結果，使日商店生意額大跌^④。往後數天，該報繼續跟進「排日風潮」，也進一步報導南洋各地日貨停市消息^⑤。凡此種種，足以說明陳謙是把1928年5、6月份由「濟案」引發的排日風潮誤作「五四」內容。

(二) 已成「史實」的誤述：日本軍艦問題

陳謙記憶中的日本軍艦問題，則不論是在時間上和史實上都存在根本

性錯誤。陳謙提及1919年五四爆發後，日方立即派出三艘巨型戰艦抵港以示恫嚇。將此說對照當時數份報章，便知錯謬甚多。首先，三艘戰艦不可能在1919年抵港。「長門」(ながと, NAGATO)、「陸奧」(むつ, MUTSU)、「扶桑」(ふそう, FUSO)，對熟悉戰前軍艦發展史者而言自不陌生。它們在上世紀初列強競逐海上霸權的風雲歲月叱吒一時^⑥。除「扶桑」外，其餘二艘在1919年仍未建成下水。它們第一次出現在香港水域是1928年4月，乃應邀「訪港」和進行「軍事交流」，絕非「示威恫嚇」。對此，當時中西報刊足資證說。

1928年4月10日，《南華早報》便以〈日本艦隊：巨型艦隻維港五日遊〉(“The Japanese Fleet: Giant Warships in Harbour on Five Days Visit”)為題，以極長篇幅詳細報導三艘日艦抵港情形，清楚交代它們在1928年4月9日早上11時抵港後，於駐港英軍司令、港英政府官員、日僑等的歡迎下展開為期五天的「官式訪問」^⑦。相同報導還見於4月10日、11日及12日的《華僑日報》。該報同樣詳細報導日艦抵港當天英軍將領和港督的歡迎儀式，並有數張相片供人覽閱^⑧。

日艦訪港期間的新聞重點大致有如下數點：(1) 日艦官兵千餘人在英軍陪同下登岸「各處遊覽」；(2) 日英戰機聯合舉行了「數十分鐘、大為可觀」的花式飛行表演；(3) 全體日軍出席各種大大小小的酬酢宴飲活動；(4) 日艦開放，千餘華人前往參觀^⑨。凡此種種，均可見日艦訪港乃得駐港英軍和港英政府的隆重歡迎和熱情款待。此外，香港華商總會也在4月13日正午「公宴日本艦隊上級軍官」^⑩。

陳謙把1928年5、6月份由「濟案」引發的排日風潮誤作「五四」內容。他記憶中的日本軍艦問題，則不論是在時間上和史實上都存在根本性錯誤。三艘戰艦於1928年4月應邀「訪港」和進行「軍事交流」，絕非「示威恫嚇」。

日艦在港官式訪問的種種酬酢活動、不下千餘華人登艦參觀之盛況，當時各大報刊均報導甚詳，這一切與目前「香港史」或「五四在香港」的持論大相逕庭。其實，日本戰艦在上世紀初經常頻繁穿梭於東、南洋海域，1919年前後二十多年間也經常訪港，並獲港府隆重招待。香港是日艦來回日本殖民地台灣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南洋海域的中途站。此外，日本民間船隻往來香港的次數更出乎想像：單是1919年，日本船舶駛入香港計有1,148次；中國船隻總數只有854次，美國也只有150次，俄羅斯則只有8次^⑩。

出現上述情況，乃源自英日兩國在1902年至1923年8月二十多年間締結同盟條約。兩國為了牽制俄羅斯在遠東擴張勢力而建立連串互助互利條約；在此前提下，1919年的港英政府為保障英日關係自然難容香港一隅發生排日運動。當然，英國政府、港英政府在同盟協約下也不許日艦炮口對準香港。同樣，日本在1919年也絕對不會為了並未受任何威脅的千多名日僑而向其同盟無故大動干戈。論者說1919年五四運動後日艦壓港，純屬無稽謬論。

1919至1927年間雖曾出現零星抵制日貨行動，但在港府速決快變的處理手段下，港人的排日民族情緒並未擴散，港督於這段期間也未向英國殖民部呈報任何港人排日活動的函件。這一切實源於港府各種防患於未然之措施，而相關管治經驗蓋取自1908年一場讓港督及政府上下意料不及的大規模反日暴動。

1908年2月，日輪「二辰丸」在中國海域公然走私軍火而被中國海軍截

獲，結果是中方被逼作出備受侮辱的舉措：向日方道歉、賠償日輪損失、懲處中方涉事官員。港報如《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華字日報》在2月中旬連刊相關消息。消息傳到廣東後即引起「紳民大憤、群情鼓噪，醞釀罷市暴動及抵制日貨」^⑪。廣州反日運動反過來進一步激發香港商行、市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他們群起呼應，促成遠盛於五四的省、港排日風潮。港人排日情緒在11月1日至3日達至高潮，連續三天的反日大暴動，近千港人盡毀雲集港島西營盤、荷李活道一帶的日人商舖，港府出動警察、軍隊強加鎮壓，被捕而判罰者達119人^⑫，當中9人因觸犯1886年頒布的保安條例第十條而被逐出境^⑬。

對於是次風潮，港督盧吉(Frederick Lugard)自事發起至1909年2月期間與英國殖民部緊密溝通，港府和英國政府也忙於與中日雙方協商解決方案，使之各得安撫^⑭。對於外來的(或「入侵的」)港英政府管治班子與英國政府而言，是次激烈的排日運動和港人極其高漲的民族情緒讓他們大為緊張。但即便如此激烈的反日運動，日方當年也未派軍艦「恫嚇」。

可見，相對1908年的排日風潮，五四以來的反日規模絕對不大。誠如陳君葆所言，港人只受到「一些衝擊」，本欲抗議的港大學生在校方「勸諭」後「默默地散去。一時的鼓噪漸靜止下來，憤恨像石頭一樣硬咽向肚裏去」^⑮。這種情況絕不是中國大陸學者說的「在『五四』風暴的推動下，香港大學的學生也掀起了反帝浪潮」^⑯。

香港五四風潮遠遠未如廣州、上海、北京等地熱烈，固與其異於前述數地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

1919至1927年間雖曾出現零星抵制日貨行動，但在港府速決快變的處理手段下，港人的排日民族情緒並未擴散，這一切實源於港府各種防患於未然之措施，而相關管治經驗蓋取自1908年一場讓港督及政府上下意料不及的大規模反日暴動。

也許是史料的難覓，也許是亟於證成港人在殖民主義壓迫下仍心繫民族的論點，陳謙記憶中的「五四」，成為往後研究者極佳的歷史例證。大量著作不斷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想像和推斷出連串粗疏結論。

的角色有關，當然也與香港作為與日本結盟的英國的殖民地有關。港英政府自然警惕排日風潮，並在吸取1908年的經驗後明白預防勝於治療的道理，於1919年加緊報刊管制，嚴防反日民族情緒滋長。故當時報載「抵制日貨」新聞，多以「某」字取代「日」字。如《華字日報》報導拒賣日貨公司新聞時即寫作「聞某等公司亦止辦某國貨物」³⁷。警方當局加強巡查，示諭港人不得在公眾地方張貼罷買日貨傳單，否則，可即「拘案控究」，理由是「本港係英國屬土，非比內地」³⁸。這些均反映英國政府或港英政府很憂慮港人的民族情緒因排日之故而爆發，再次釀成難以收拾的局面。故在港府每根神經極其敏感的情況下，數名陶英學校中學生手持寫有「國貨」二字的油紙傘上街，即被警察如臨大敵般拘捕，連帶所屬學校校長亦不知就裏地被迅即拘留，告以「主使及輔助各學生九人手持雨傘，用白油大書特書『國貨』二字」。他們被看作對日貨有「提倡抵制之舉動」而被拘，但以「出會未先向華民政務司署領取執照」的罪名被罰³⁹。

上述強硬手段反映港英政府把港人排日情緒、民族情緒止息於萌芽狀態的管治策略，反映他們當時並不只源於協約需要而採取「親日」態度，同時亦因為出於更深層且無時無刻的「恐中」因素——港人的中國意識、時有所聞所見的「趕走洋鬼子」口號與標語、國民軍政府外交政策。這些在武昌革命成功前後一段很長時間的大變局時期，無時不拉扯着港府的每一根神經，當時的港府檔案文獻或後來學者的相關研究已足以提供相關佐證，此處不擬再詳談⁴⁰。

在各種因素湊合下，香港社會在1928年4月份大體上表現出歡迎日艦訪

港的氣氛（當然，如日艦在5月「濟案」發生後訪港，情況可能有異）。如把日軍巡洋艦訪港抽離於歷史文本任意解說，容易在反殖、反帝民族主義情緒下將之歪曲為極具威嚇性的歷史事件。也許，這樣做有助於塑造「五四」在當時造成的社會迴響或是提高其歷史意義，但這畢竟不是事實，反而混淆了歷史研究視線。也許是史料的難覓，也許是亟於證成港人在殖民主義壓迫下仍心繫民族的論點，陳謙記憶中的「五四」及其迴響，成為往後研究者極佳的歷史例證。於是，大量著作不斷重現陳謙記憶中的「五四」，並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想像和推斷出連串粗疏結論：

「五四」運動對香港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反帝反封建思想開始深入人心，社會的面貌和風氣也發生了不少變化。……和內地一樣，「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在香港蓬勃興起……⁴¹

香港學生積極響應〔抗議活動〕……而港英政府採取親日態度，並用高壓手段限制示威活動。……但無論怎樣，「五·四」運動還是極大地改變了香港，這之後，英文書院的學生們開始着西裝，從此拋棄了陳舊的晚清服飾。⁴²

上述香港學生改變服飾的說法，只是無根之談。皇仁書院的一張歷史照片清楚顯示學生在1912年便已身穿西服⁴³，「五四」後「開始着西裝」之談乃想當然罷了。其他疏漏，毋庸在此一一細辨。

陳謙回憶六十年前以十六歲幼齡所見之事，當中部分敘述的不實，也許是如其所言出於記憶退化之故；也許是為了強化中港水濃於水的關係，

以及揭露帝國主義、殖民地政府的邪惡；當然，也很可能是為了要凸顯「五四」的歷史震撼性，致使香港一隅出現英日雙方必須嚴陣以待的局面與反響，使五四運動從中心到各地域的巨大影響力得以形塑，使其光輝傳統有新的創闢和延續。

無可否認，高揚「五四」在港發展的絕大部分言論，都表現出民族主義色彩；當然，論者自身本已存在的民族情緒更是自不待言。除卻共同的民族情感外，左、右分裂和取中而行的政治思想或意識形態均影響不同的人，塑造着不同的「五四」形象。未太受左、右分裂政治觀念影響的陳君葆，較看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自由傳統多於五四抵制日貨運動的內容；而受左翼「五四」話語影響的陳謙則更為強調五四愛國反帝運動如何波瀾壯闊、如何在殖民地引起震撼效果。陳謙憶寫史事時正處於國內反帝、反殖政治意識未退潮之際，他難以擺脫一甲子以來中共官方塑造的五四精神傳統也是不難明白的。至於後來沿襲其論者，多為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而有陳陳相因的論述。

在香港回歸祖國的氛圍下，中港百年來若即若離的關係亟待定調，消弭彼此在思想文化或意識形態上的隔閡與差異成為時代的任務。香港研究領域下的「五四」研究既能批判帝國主義對香港的侵奪與殖民化統治，也能強化港人自始至今心繫祖國的國情教育，確立國事凌夷下港人與國內同胞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傳統；而這些又可洗脫早期關於香港只為英國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消極認識。五四運動成為組合這種話語的眾多歷史場域之一。因應論者時代關懷和現實目的各不相同，一個個對應現實社會、

政治需要的「五四」話語又同時應運而生。

三 走出「五四在香港」的話語迷思

不少研究指出，除了政治層面、街頭層面的「五四」迅速感染港人外，以思想啟蒙為主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香港的在地化發展與國內城市亦步調如一。前述「和內地一樣，『五四』新文化運動也在香港蓬勃興起」的論調，只是其中一例。事實上，反帝排日的「五四」在香港得以發展乃由很多因素構成。它既受本已有之的抵制日貨先例影響，也有港人自身「身份」、「國家」意識交織其中產生的影響。故談其發展，有需要把排日層面的「五四」和新文化層面的「五四」分開細察。

目前所見，政治層面的「五四」抵制日貨運動得以在香港發展，首先與香港當時作為一個高度流動的移民社會息息相關，而港粵因地緣之故在政經、民生密切交往又直接構成其另外一些要素。這一切都得從香港的人口結構談起。

香港本土出生的居民在1921年只佔全部人口的26.7%，1931年上升至32.5%，1961年才增加至47.7%，直至1971年才超過50%^④。研究指出，過去大半個世紀，在港華人在歷經多次「湧入湧出的潮流」後，才在1960年後放棄返回社會主義祖國的念頭；當他們的後代難以在香港以外找到家國之後，香港才逐漸形成一個穩定的華人社會^⑤。換言之，1920年代的居港華人只視香港為避難所或暫時居留地，待內地時局稍靖即如候鳥北返。正如論者所言，香港的早期歷史主要是

目前所見，政治層面的「五四」抵制日貨運動得以在香港發展，首先與香港當時是高度流動的移民社會息息相關，而港粵因地緣之故在政經、民生密切交往又直接構成其另外一些要素。

「移民在異地求生存的歷史」——「不同的時期，大批中國人因為逃避中國的政治動蕩跑到香港來，動蕩過後大批的人又跑回老家去。這種情況基本上延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⁴⁶

在上述情況下，港人儘管寄身殖民地，但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毋需置疑，也不會動搖。港人大部分都來自廣東珠三角、東江沿岸一帶⁴⁷，香港於他們而言只是暫居之地。此外，只有極少數華人代表或後來的英籍華人才能參與香港社會政治，港人的「香港」意識遂難構成，致使港人時刻注目中國內地。就此，當時暢銷的《華字日報》，其編採手法值得一提。該報每天大量刊載中國內地大小新聞。北京、上海等數個中心城市的新聞長期居於報刊主版，透顯清晰的「國家」意識。從「粵聞」專欄所佔篇幅比「香港新聞」還要寬大來看，該報對廣州這個南方政治中心的新聞也是極為關注的，反映其一定的地緣、政治意識，呈現該報及其讀者的辦報、閱報心態。

從一般港人到紳商、政府官員，都時刻關注設於廣州的中華民國軍政府的情況。香港在政經、民生等方面深受其影響早見於大量研究，此處可不再贅言。要注意的是：每當廣州興起抵制行動，風潮便很快波及香港。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港穗兩地的排日人士在早期的抵制運動中互動頻繁。1908年港府行政報告指出，是年11月的暴動乃由40名潛入香港的廣州救國會成員策動⁴⁸；1919年的五四抵制日貨行動，只能在港府監控下低調進行，但未能阻止一些港人轉移陣地奔赴廣州聲援。廣州《大同日報》嘗禮讚港人之舉動曰：「在外人主治之下，猶能乃心祖國，力挽狂瀾，使國內之涼血動物聞之，能不愧死耶?!」⁴⁹

要之，當明白港人在當時只有「中國人」身份認同而「香港」意識淡薄、當了解香港與中國——特別是以廣州為中心的廣東省的緊密關係時，對1919年五四抵制日貨、排日風潮在香港引起的迴響也就不必大驚小怪。由此可見，1908和1919年的港人抵制日貨行動均響應廣州反日之風而起。這既顯出香港的「五四」有其時間連續性，也有其對國內鄰近地區的空間延展性。而這一切都取決於早期香港社會人口組成的特殊因素，致使港人的思想世界無時不受內地政局牽扯帶動。職是，當了解早期港人的家國認同感，便能認識其愛國心之所本所據；如是，也就能理解到何以排日反帝層面的「五四」能在此引起迴響的深層原因。

然而，相對來說，在中國內地與抵制日貨運動齊頭並進的「五四」另一層內容——以「德先生」、「賽先生」為旗幟的思想啟蒙或新文化運動，在香港卻一直滯後。這固然與國人、港人較易感受日本帝國主義帶給他們的很實在的國家危機感、恥辱感和仇恨感有關，致使街頭層面的「五四」反日行動易成風潮；相反，文化運動則從來不是生活在一個長期超過95%文盲率國度下的普羅大眾所可知曉。其次，也許是源於「禮失求諸野」的信念傳統，身處邊緣地區的知識精英在思想上卻比中心地區的同儕更保守和執著，對新文化表現得更排拒。換過來說，新文化意識也更難在此生根發芽。一位香港本土作家在1966年回憶⁵⁰：

在四十年前，提起「新文化」是不受歡迎的。「五四」運動給予香港社會的影響，似乎只有「抵制日本貨」的概念，「文學革命」這一面的意義，卻沒有能

也許是源於「禮失求諸野」的信念傳統，身處邊緣地區的知識精英在思想上卻比中心地區的同儕更保守和執著，對新文化表現得更排拒。換過來說，新文化意識也更難在香港生根發芽。

夠在這個封建思想的堅強堡壘裏面發生甚麼作用。那時候，頭腦頑固的人不但反對白話文，簡直也否定白話文是中國正統文字。這些人在教育上提倡「尊師重道」和攻讀四書五經以保存「國粹」；看見有人用白話文寫甚麼，便要搖頭嘆息「國粹淪亡」，對於孔聖人簡直是「大逆不道」。

魯迅在1927年到香港講學後便留下差劣印象，將之譏為「英人的樂園」，把南來視為「總是一個畏途」；瀟漫香江的國粹論調最為其不齒，所謂「若夫『香江』之於國粹，則確是正在大振興而特振興」，矛頭直指時任總督的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和香港大學中文總教習賴際熙太史^⑤。魯迅後來在其文章中轉錄了一篇刊於《循環日報》、名為《孔誕祝聖言感》的文章，讓人了解到他何以嘲諷香港文化保守落後的原因，也讓人了解到香港部分人士何以與新文化運動產生隔閡之故——讓人認識到「新」、「舊」相互輕詆譏誚的問題結穴。他以調侃筆調寫下兩闕對聯譏刺香港違時而行的孔子聖誕活動，把尊孔崇聖嘲為別有意圖的「大英德政」^⑥。種種壞印象成為魯迅多年揮之不去的負面記憶，使其數年後對當天演講被禁刊仍然憤怒不已，在他筆下，香港被稱為「這樣的香港」——「粗淺平庸到這地步」，呈現出一副閉塞、守舊的人文圖景^⑦。

可惜，魯迅並不了解在這個被割棄的邊緣小島上的華人心態。港人直至1927年仍未「有幸」受急風暴雨式的「五四」現代化洗禮。有識之士的真實感遇不是別的，乃是殖民地政府各種歧視政策，種種複雜的文化鄉愁和民族意識因此而無時不在。尊孔背後蘊含的內容之一就是要與西方文化、基

督教文明，乃至細小到港府的中文歧視政策相互抗衡。然而，與魯迅一樣，其他五四文化人在不了解香港的獨特歷史語境和社會政治文化氛圍下，群趨譏刺香港的落伍與保守。

新文化運動領導人胡適曾於1935年赴港領受榮譽博士和發表五場演講。他隨後發表的〈南遊雜憶〉批評香港大學說：「這裏的文科比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說是完全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不發生關係。」^⑧胡適隨後推薦許地山出掌港大中文系，使其課程從此「煥然革新」^⑨。此前，香港新文化發展因遲緩不前之勢而招來新文化群體譏評，視之為「文化荒園」^⑩，普遍不懷好感^⑪。出於對新的鍾好和對舊的厭惡，許氏南下遂極端化地被看作一切改變的開始。其抵港之年不無誇張地被視為區分新舊香港文化的臨界線——「小而言之，據說香港的文化可說是許先生一年開拓出來的。」^⑫他本人也被放大為「香港文化界的『執牛耳者』」，一改昔日「一切新思潮是吹不進，打不入」的舊局面^⑬。

上述不少言論都充滿新、舊對立的想像，倒反映1930年代以來新文化群體在香港苦於開拓新文化、新文學突破口的心境寫照。但是，在內心深處而言，不論是身在國內還是寄居香港的南下學人，均甚為輕視香港學術文化氛圍。借用論者之言：「一直到抗日戰爭的前夕，國內學術界是不肯承認香港在國學研究上有甚麼貢獻的……輕視的態度則雖在時移世易之後仍不能盡改。」^⑭就舊學陣營而言，香港除了數位名不見經傳的前清翰林外，實無任何可注目者；對於以胡適為中心的趨新之徒而言，他們的「整理國故」運動在香港也毫無聲色和響應者。準此，早期中、港於新文化層

港人直至1927年仍未「有幸」受急風暴雨式的「五四」現代化洗禮。有識之士的真實感遇不是別的，乃是殖民地政府各種歧視政策，種種複雜的文化鄉愁和民族意識因此而無時不在。

面「五四」存在的疏隔和斷裂，與彼此在政治層面「五四」較為緊密的情形對比甚大。

要之，香港只受反帝排日的政治層面「五四」影響；以思想啟蒙為中心、以少數知識精英為主體的文化層面「五四」，遲遲未能波及香港。新文化長期在香港得不到迴響，正是陳君葆何以在回憶「五四」時一再感到失落的原因所在。

四 結論

目前不少研究五四運動在香港發展的文章，除了揭示百年殖民統治陰暗面外，還強化了港人在殖民地統治下如何保持高昂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構成香港「五四」愛國、反殖民話語——批判萬惡之英、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凸顯港人與祖國血濃於水、同根共感的愛國情懷與民族意識，傳達國家歸屬感、認同感的信息，述說香港人與廣州人、上海人、北京人向來毫無二致的愛國熱情，使香港進一步被納入「國家」、「民族」的視角與思想框架下，最後達至加強香港與祖國關係的目的。這些論述很多都是在應合現實需要的情況下、在1997年「香港前途」議題下出籠，藉着塑造五四運動在香港引起巨大迴響的圖景，闡揚港人思想情感從未與祖國母體脫離的事實，進而為「新時代」強化「香港人」是「中國人」的意識、香港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土地」的政治命題，使香港地方史向國家大歷史不斷靠攏。

五四運動自其發生至邁向一百周年的紀念／探究歷程，一直都是與「現實」的各種干擾相生相成。即使是

在邊緣——如王韜所說的「蕞爾小島」上，它的在地化發展和論述也同樣難以擺脫此一宿命。

註釋

① 參見彭明：《五四運動在北京》（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中共浙江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五四運動在浙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胡文本、田克深編：《五四運動在山東資料選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河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編輯室編：《五四運動在河南》（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五四運動在江西：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南昌：《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1989）；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主編：《五四運動在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五四運動在江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小野信爾：《五四運動在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3）。

② 王汎森：〈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9年6月號，頁52。

③④⑤ 陳君葆：〈四十年的回憶——寫於「五四」運動四十週年〉，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文集》（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383；384；384。原載於香港《新晚報》，1959年5月4日。

④ 參見楊亮功、蔡曉舟編：《五四——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頁140、139-40。

⑤ 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五四反思與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之

五四運動自其發生至邁向一百周年的紀念／探究歷程，一直都是與「現實」的各種干擾相生相成。即使是在邊緣——如王韜所說的「蕞爾小島」上，它的在地化發展和論述也同樣難以擺脫此一宿命。

爭》(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2), 頁6。

⑥⑧⑨⑩⑬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 第二十四輯(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79), 頁40-45; 40-41; 41-42; 42-43; 40。

⑰ 參見劉蜀永:《香港歷史雜談》(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頁32-34; 金應熙:〈「五四」風暴捲香江〉, 載《香港史話》(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8), 頁175-78;〈五四運動在香港〉, 載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編:《五四運動畫冊》(香港: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9), 頁78-81;〈五四運動在香港〉, 載賀弘景主編:《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 頁117-18; 楊曉山:〈五四運動在香港〉,《黨史文匯》, 1996年第5期, 頁38-40; 林慶元、李景端主編:《百年風雨話香港》(南京: 譯林出版社, 1997), 頁96-98;〈五四運動與香港〉, 載劉小清、劉曉滇編著:《香港野史》(北京: 東方出版社, 1997), 頁364-65; 阿憶:〈「五·四」運動在香港〉, 載《香港百年——中央電視台大型系列專題片〈香港百年〉解說詞》(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7), 頁74-75; 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關係史: 1840-1984》(香港: 麒麟書業有限公司, 1997), 頁135; 楊仁飛:〈粵港澳近代關係論析〉, 載程美寶、趙雨樂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 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1999), 頁162-63; 蔡榮芳:〈五四運動與香港, 1919年〉, 載《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1945》(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1), 頁106; 鄧開頌:〈民國時期粵港關係的特點〉, 載陳明鈔、饒美蛟編:《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係, 1900-1938》(香港: 商務印書館, 2010), 頁164-65。

⑱⑳ 金應熙:〈「五四」風暴捲香江〉, 頁175-77; 177。

㉑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纂:《民國廣東大事記》(廣州: 羊城晚報出版社, 2002), 頁102。

㉒ 蔡榮芳:〈五四運動與香港, 1919年〉, 頁102-104。

㉓ 鄧開頌:〈民國時期粵港關係的特點〉, 頁164-65。

㉔ 〈學生被拘述聞〉,《華字日報》, 1919年6月4日。

㉕ 〈本港自由貿易舉動〉、〈土貨暢銷之一斑〉、〈香港本年商務之回顧〉,《華字日報》, 1919年5月26日、6月12日、12月27日。

㉖ 〈西報所述之杯葛日貨近況〉,《華字日報》, 1923年5月9日。

㉗ 〈排日聲中之各訊〉,《華字日報》, 1928年5月21日。

㉘ 〈日商店被人擲石〉,《華字日報》, 1928年5月22日。

㉙ 〈灣仔擲石毀物案二宗〉,《華字日報》, 1928年5月21日。

㉚ 〈本港發現對日種種〉,《華字日報》, 1928年5月24日。

㉛ 關於排日的情況, 參見〈反日激烈傳單案提堂〉、〈昨日訊結反日宣傳案二宗〉、〈昨日又判決反日宣傳案二宗·被告五人每入苦監九月〉、〈激烈傳單案初審〉、〈激烈傳單案兩宗〉,《華字日報》, 1928年5月24日、5月29日、6月2日、6月12日、6月13日; 關於香港與南洋的日、華商販斷絕商品貿易的報導, 參見〈排日消息種種·本港日本生意、南洋華僑排日之熱烈〉、〈排日消息種種〉,《華字日報》, 1928年5月31日、6月1日。

㉜ 「長門」(1920年建成)和「陸奧」(1921年建成)被合稱為「戰前日本海軍的象徵」。前者為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座乘旗艦, 後者則是中途島戰役中的後方部隊主力。參見片桐大自著, 陳寶蓮等譯:《聯合艦隊軍艦大全》(台北: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7), 頁27、37。

㉝ “The Japanese Fleet: Giant Warships in Harbour on Five Days Visi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0 April 1928, 11.

㉞ 〈日本第一艦隊昨晨抵港詳情〉、〈日本第一艦隊抵港後之第二天〉、〈昨日參觀日艦及見聞種種〉,《華僑日報》, 1928年4月10日、4月11日、4月12日。

㉟ 〈昨日參觀日艦及見聞種種〉,《華僑日報》, 1928年4月12日。

- ⑳ 〈日本第一艦隊抵港後之第二天〉，《華僑日報》，1928年4月11日。
- ㉑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19*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20), 9.
- ㉒⑳ 陳湛頤、楊詠賢編：《香港日本關係年表》(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4)，頁71-72；72。
- ㉓ 1908年11月1日至3日發生的排日暴動情況及港英政府當時的鎮壓措施，參見F. J. Badeley (Captain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Report on the Riots", 7th November 1908. C.O. 129/349, 261-63。
- ㉔ Frederick Lugard to Colonial Secretary, 24th December 1908. C.O. 129/349, 547.
- ㉕ Frederick Lugard to Britannic Majesty's Ambassador, Tokio, 29th April 1908. C.O.129/351, 713-15；另見Sir C. MacDonald (British Ambassador to Japan) to Sir Edward Gre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British), 8th June 1908. C.O. 129/351, 719-20。
- ㉖ 〈本港自由貿易舉動〉，《華字日報》，1919年5月26日。
- ㉗ 〈訓諭〉，《華字日報》，1919年5月28日。
- ㉘ 〈學生被拘述聞〉、〈學生持雨傘遊街案續訊〉，《華字日報》，1919年6月4日、6月9日。
- ㉙ 吳倫霓霞：〈香港對武昌革命的反應及與粵軍政府的關係〉，載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編：《史藪——紀念慶祝建校三十周年學術論文集》，第一卷(香港：學峰文化事業公司，1994)，頁203-19。
- ㉚ 《百年風雨話香港》，頁98。
- ㉛ 阿憶：〈「五·四」運動在香港〉，頁75。
- ㉜ 皇仁書院編：《皇仁書院歷史圖片集》(香港：皇仁書院，1993)，頁29。
- ㉝ 《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第一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頁121。另有研究指出在1961年的人口普查時，才首次見到香港本土出生人口超過總人口的一半。參見關信基：〈香港政治社會的形成〉，載劉青峰、關小春編：《轉化中的香港：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103。
- ㉞ 劉兆佳：〈「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分認同1985-1995〉，載《轉化中的香港》，頁5。
- ㉟ 關信基：〈香港政治社會的形成〉，頁101。
- ㊱ 論者更有「歷史上香港居民的90%以上均來自廣東」之說。參見張俊義：〈20世紀初粵港政局之互動〉，載《嶺南近代史論》，頁174。
- ㊲ 《大同日報》(1919年11月8日、10日)，引自沙東迅：《五四運動在廣東》，頁171。
- ㊳ 呂倫：〈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載《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1985)，頁3。
- ㊴ 魯迅：〈略談香港〉，載《魯迅全集》，第三卷(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73)，頁322、324。原發表於《語絲》，第144期，1927年8月13日。又見〈再談香港〉，載《魯迅全集》，第三卷，頁400-406。
- ㊵ 魯迅：〈述香港恭祝聖誕〉，載《魯迅全集》，第四卷，頁43。原發表於《語絲》，第156期，1927年11月26日。
- ㊶ 魯迅：〈三閑集·序言〉(1932年4月24日)，載《魯迅全集》，第四卷，頁6。
- ㊷ 胡適：〈南遊雜憶〉，載《胡適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315。
- ㊸ 〈許地山先生生平事略〉，載盧璋鑾編：《許地山卷》(香港：三聯書店，1990)，頁1-2。
- ㊹ 師山：〈島上的悲風：悼吾友許地山先生〉，載《許地山卷》，頁35。
- ㊺ 有關文章參見盧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1983)。
- ㊻ 柳亞子：〈我和許地山先生的因緣〉，載《許地山卷》，頁76。
- ㊼ 容肇祖：〈追憶許地山先生〉，載《許地山卷》，頁41。
- ㊽ 余英時：〈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載《轉化中的香港》，頁44。

陳學然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助理教授